

從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圖 ——歐洲所繪粵道地圖譜系考釋（1655 — 1815）*

楊迅凌

[摘要] 本文對 1655 — 1815 年間經粵道入華的歐洲諸國繪製的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線地圖的譜系進行整理和考釋。文章首先概述了 17 — 19 世紀歐洲人繪製粵道地圖的歷史背景，在朝貢體系下如何從澳門和廣州前往中國政治中樞北京以實現其外交目的，是西洋各國繪製這條貢道的主要原因。筆者以荷蘭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芬彭士的《經澳門由廣州至北京內河航道圖》為代表，介紹了該類地圖的主要繪製內容；把該類地圖分為尼霍夫、馬嘎爾尼、范罷覽、阿美士德、入華耶穌會士等五個主要譜系，對其主要作品和特點進行分析。通過這些古地圖史料，可以較好地還原這條經珠江水系、長江水系、京杭大運河而從澳門直抵北京的內河航線在清代的真實面貌，挖掘歷史上澳門通過這條路線在明清兩代中外交往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and 價值。

[關鍵詞] 澳門 粵道 古地圖 中外交流

一、粵道與西洋貢國

在 17 — 18 世紀歐洲繪製的有關中國的地圖中，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些地圖將澳門標示在這條約 2,400 公里的航線的最南端，沿着一條非常明顯的水路幹道向北深入中國內陸，最終抵達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有趣的是，同一時期中國人自己繪製的地圖中，這條內河航線很少被提及；相比之下，這條航線在歐洲繪製的地圖上卻被突出地標註出來，顯示這條航道在當時西方人心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同的製圖者使用各自的繪製手法專門繪製這條航線，或在地圖上以特殊的方式將其標繪出來，折射出西方對中國貿易的渴望，同時也揭示出中西方地圖製圖視角的差異。

粵道，又稱廣東道，自古是聯繫嶺南與內地的重要通道，在中外貿易和交流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漢時期，廣州（番禺）已經成為嶺南的行政與交通中心。隨着航海貿易的發展，廣州港逐步開通了前往東南亞、南亞、西亞的海上航路。唐朝時，廣州港已經發展成全國的第一大港，並在開元十年（722）專門設立了市舶司。隨着廣州海上交通貿易的發展，嶺南與內地的物資流動也日益增加。為適應發展的需要，唐開元十六年（728）張

* 本文係“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作者簡介：楊迅凌，澳門大學圖書館館員、國際關係博士。

九齡奉命開闢大庾嶺，在原秦代小梅關以東隘口另闢新道，可容數車並行通過，大大改善了路況條件，並縮短了里程。沿途設有驛站、驛館，促進了內地與嶺南的人員物資往來與交流，構成了從長安依次經洛陽、汴河、淮河、江南運河、杭州、錢塘江、常山、玉山、信江、鄱陽湖、贛江、大庾嶺、潁水、北江，最後抵達廣州的南北水陸交通要道。^①

宋元時期完成了對外貿易重心由西北陸路向東南海路的轉移。^②宋太宗曾“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由海道來”；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朝廷規定“海外蕃國貢方物至廣州者，自今犀象、珠貝、揀香、異寶聽資持赴闕”，其餘“非貢奉物，悉收稅算”，同時“賜與所得貿易雜物則免稅算，自餘私物不在此例”。^③宋仁宗令各國進奉“今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④南宋偏安杭州，交通重心向閩浙偏移，廣州港的重要性逐漸被泉州港取代。元代疆域遼闊，為實現人員往來、信息傳遞和物資運輸，朝廷設立了遍佈全國的驛站網絡，其中內河與沿海地區都設有大量的水驛。泉州在元代延續了最大的對外貿易港的地位，外國使臣從泉州沿陸路或海路轉運至杭州，再由京杭運河入大都。^⑤

明代定都北京後，重整運河，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主要通道。銜接大運河、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粵道在對外關係上再次發揮重要作用。《明會典》記載 62 個朝貢國，除日本和朝鮮外，均為南海諸國。明代大部分時間對內實行海禁，禁止民間出海貿易；對外推行以朝貢為唯一形式的海外貿易政策，不允許中外商人自由進行航海貿易，從而使朝貢貿易成為明代中外貿易的唯一形式。為有效管理諸國人貢互市，明朝設立廣東、福建、浙江市舶提舉司，並規定海外朝貢國必須由指定的貢道入貢，其中由廣東貢道入貢的國家包括暹羅、占城、爪哇、真臘、三佛齊、蘇門答臘、西洋瑣里、滿刺加、蘇祿、古里、榜葛刺、錫蘭山等；由於海路運輸更加便利，本應從廣西憑祥州入貢的安南也曾由廣東入貢。^⑥三市舶司中，廣州職責最重，設懷遠驛，有房舍 120 多間；置驛丞一人，專門負責接待各國貢使與隨行人員。^⑦

1415 年葡萄牙人拉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也啟動了早期全球化的進程。經過近一百年的探索，葡萄牙人於 1513 年前後抵達珠江口海岸，並於 1557 年通過租借的方式在澳門正式建立定居點。^⑧澳門港城也因此成為最早融入早期全球化體系的中國城市，不僅成為聯結全球貿易航線的關鍵樞紐，也扮演着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交匯點的角色，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此後數百年間，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丹麥、瑞典、美國等西方各國接踵而來，甚至俄羅斯都曾試圖開闢前往澳門的航線，打通由南方進入中國的路線。

^①傅林祥：《交流與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64—72。

^②黃純艷：《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445—458。

^③《宋會要輯稿》〈番夷〉七之二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9947—9948。

^④〈天聖元年十一月癸卯〉，《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01，頁 2342。

^⑤傅林祥：《交流與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03—113。

^⑥萬曆《明會典》卷一〇五、一〇六〈朝貢〉一、二；〔明〕成化《廣州志》卷三二〈諸番類〉補。

^⑦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二〈雜錄〉三，光緒五年刻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sc/item/cuhk-2161643>。

^⑧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7—18、113。

在古代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下，要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就必須進行朝貢。前往北京謁見皇帝的外國貢使必須攜帶國書，在廣州等待朝廷的批文，獲准後方可啟程入京。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各國的人員、船隻和貨物要進入中國，首先第一站就是澳門。1757年後至鴉片戰爭前，澳門又因為“廣州一口通商”成為西方各國在中國沿海住冬和等待進入廣州的唯一居留地。

葡萄牙的皮雷斯使團是第一個通過粵道抵達北京的歐洲使團。1517年，葡印總督阿爾伯加瑞亞（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任命的葡萄牙首任赴華使節皮雷斯（Tomé Pires，約1468—約1524）“以進貢請封為名”抵達廣州，^①但明廷拒絕了葡萄牙使臣“入貢”的請求。^②然而，在使團的不斷努力下，明廷於1520年批准使團一行30人由廣州北上前往南京並見到為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而南下的明武宗。^③武宗接待了使團，同時允許葡萄牙使臣先行去北京等候。1522年皮雷斯使團抵達北京，正式向皇帝遞交國書。在目前已知的皮雷斯入華使團存留的材料當中並無地圖存世。根據高德勝（Armando Cortesão）重製的《皮雷斯在華行程圖》（*Delineamento do Oriente Mostrando os Topónimos e Itinerários de Tomé Pires Conforme Mencionados na Suma Oriental*），^④使團從廣州前往南京、北京的路線正是粵道。但此時明廷已收到滿刺加國王向朝廷控訴該國被葡萄牙攻佔的消息；加上西蒙·德·安特拉德（Simão de Andrade）在廣東未經允許擅自修築工事，甚至在當地掠買華人子女，對皮雷斯使團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朝廷及廣東諸臣紛紛向皇帝上疏驅逐葡萄牙使團和船隻。不久，武宗病逝，嘉靖帝即位。由於文化差異與翻譯問題，閣臣們發現葡萄牙國書與使團通事所言互相矛盾，存在故意篡改的情況，故認定使團為假冒。嘉靖帝批准禮部、兵部決議，下令“禁絕番舶”，驅逐使團。當皮雷斯使團返回廣州時，中葡之間在廣東海域爆發了海戰，明朝水師以數十倍兵力擊敗了葡萄牙的艦隊。皮雷斯等人隨即被逮捕入獄，1524年病逝於廣州獄中，^⑤葡萄牙第一次出使中國在幾經波折之後宣告失敗。由於多種原因，直至150年後清代康熙年間，葡萄牙才再次向北京派出外交使團，分別是1670年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1678年白壘拉（Bento Pereira de Faria）、1720年裴拉理（何濟格，Onorato Maria Ferraris）、^⑥1726年麥德樂（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1753年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

^①〔明〕郭棐：《廣東通志》卷69〈外志三·番夷〉。

^②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9。

^③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3—42。

^④“Delineamento do Oriente Mostrando os Topónimos e Itinerários de Tomé Pires Conforme Mencionados na Suma Oriental.” *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leitura e notas de Armando Cortesão*,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8, pp. 142-143.

^⑤卡爾沃：〈廣州葡囚信〉，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91。

^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萬威·味先地·羅咱以國王的名義特遣使入貢，一說為教宗格勒孟十一世派遣來華，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二卷“清前期（1644—175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816—817。

明清鼎革後，荷蘭率先向中國派遣了使團。16世紀中後期，荷蘭人通過各種合作形式參與到葡萄牙人在遠東的航海事業當中。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奪取葡萄牙國王王位，開啓“伊比利亞聯盟”時期（1580—1640）。當時荷蘭正在從西班牙統治下尋求獨立，他們把葡萄牙也當作敵人，開始攻擊葡萄牙的海外據點。1601年荷蘭人曾試圖前往澳門，開展與中國的貿易。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擔心荷蘭人的到來會讓他們在華貿易受損，拘捕和殺害了前來打探消息的荷蘭人。^①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為與西班牙、葡萄牙爭奪海外利益，該公司被賦予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的貿易專營權，同時還有徵兵、宣戰、派遣使節和締結條約等重大權力。1602—1624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先後四次派遣艦隊前往澳門，均以失敗告終，隨後轉向台灣建立據點，直至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在台灣期間，荷蘭人通過福建商人收購中國的絲綢、瓷器等貨物。但是，台海航線和物價都由福建商人控制，荷蘭人對這樣的間接貿易並不滿意，^②希望直接開展對華貿易。

1644年滿清入關後，戰火延燒至中國東南沿海，讓荷蘭人的間接對華貿易損失慘重。當1652年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在返歐的途中被荷蘭人俘虜並帶到巴達維亞時，荷蘭人通過衛匡國瞭解到清政府對待外國人和對外貿易的態度遠比明朝開放，恢復因戰爭中斷的中國絲綢、瓷器貿易的願望似乎變得可行。衛匡國建議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清政府派出使團請求在廣州進行貿易。1653年廣州落入清軍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隨即從台灣派出初璘（Frederick Schedel）到廣州請求貿易，但因初璘未攜帶國書，遂告失敗。^③

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侯葉爾（Pieter de Goyer，清史作“杯突高嚙”）與凱賽爾（Jacob Keyzer，清史作“惹諾皆色”）攜帶國書和貢品，率使團隨行共16人前往中國，計劃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請求准許荷蘭人在廣州自由貿易。使團作為清廷建立後第一個來朝的西方國家，得到了清廷的優容，准許他們進京入貢。使團從廣州懷遠驛出發，乘中國船隻沿粵道入京。在經歷整整四個月的內河航行後，使團抵達北京成功見到順治皇帝。但順治帝對荷蘭人請求貿易的答覆是，體恤荷蘭人遠來艱辛，着八年一次來朝。荷蘭使團第一次訪華之旅以失敗告終。

康熙即位後，清廷為阻止沿海居民接濟東南沿海的明鄭勢力，於1662年頒佈了嚴格的“遷海令”，大規模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④全面禁止海上貿易。康熙年間，清廷希望藉助荷蘭的力量圍剿明鄭勢力，允許荷蘭先後四次派使團訪華。荷蘭人極力避開廣東貢道，想方設法從福建貢道入京，因為這樣可以避開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當時清廷要求西洋各國按例從粵道以外的路線赴京。但由於康熙希望通過荷蘭人剿滅明鄭勢力，或是藉助荷蘭使

^①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86—287。

^②（荷）尼霍夫（J. Nieuhof）原著；（荷）包樂史（L. Blussé）、莊國土著：《〈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1。

^③林發欽：《明清鼎革的中荷官方交往》，《中西文化研究》（澳門），總第18期（2010），頁120—129。

^④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二卷“清前期（1644—175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81。

臣傳書給俄羅斯，所以暫時破例默許荷蘭使團由福建入京。同時朝廷仍然強調荷使違例，“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道，入別道不許放進”。^①1665年侯爾恩（Pieter van Hoorn）率荷蘭第三次使團見到了康熙皇帝，荷蘭著名的遊記作家達珀（Olfert Dapper, 1639 – 1689）根據第二次、第三次使團報告出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第二次、第三次出使大清帝國海岸及內地遊記》（*Gedenkwaa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1670*）。這兩次使團都是由福建入京，遊記進一步豐富了歐洲人關於中國的知識。但使團報告和達珀的書中都沒有繪製福建貢道入京的路線地圖。與第一次荷蘭使團一樣，後來的使團都沒有成功實現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華自由貿易的目標，隨後公司放棄了努力，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派使團來華。

1684年10月，清廷收復台灣，隨之解除海禁，先後設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海外各國貿易逐步正常化。四大海關中，福建、浙江、江蘇均為地方軍政長官兼任，惟廣東海關專設監督，可見其重要性。^②清廷還將東西洋海上諸國均列為朝貢諸國，非朝貢國也可以與中國互市貿易。但因朝貢貿易免稅的優惠，各國都願意向清廷朝貢。^③

此後直至鴉片戰爭戰敗後開放“五口通商”之前，西洋各國入京路線受到朝廷的嚴格規限，正常情況下必須沿所謂廣東貢道，亦即“粵道”入京。使團從澳門出發，在廣州懷遠驛得到准許後，坐船經由珠江水系的北江到粵北的南雄，翻越梅嶺（即大庾嶺）進入江西境內，繼續乘船經贛江進入長江，再通過京杭大運河直抵北京。通過這條“粵道”入華赴京的西洋各國，被清代梁廷柅在《粵道貢國說》中稱作“粵道貢國”。梁廷柅在書中分別記載了荷蘭、西洋國和博爾都噶爾雅（均指葡萄牙）、意大利亞、英吉利等歐洲訪華使團的過程。除這四國外，1698 – 1703年法國商船“安菲特利特號”（*L'Amphitrite*）兩次訪華，以及明清兩代入華傳教士以及教宗特使多羅等人基本上都是通過這條“粵道”入京，他們所帶來的西洋器物、科學知識和技術、文化也是通過這條路線向中國內地進行輻射。可以說，這條從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不僅是西洋各國來華的朝貢之路，也是中外貿易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

二、歐洲所繪粵道地圖的主要內容

歐洲繪製專門表現粵道路線或以特別方式標註該路線的地圖不下30種。目前已知歐洲最早繪製的粵道圖可以追溯到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所繪地圖。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為使團配備了一名管事兼畫家約翰·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 1618 – 1672），要求

^①《粵道貢國說》，〔清〕梁廷柅：《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②〔清〕梁廷柅等纂：《粵海關志》卷七〈設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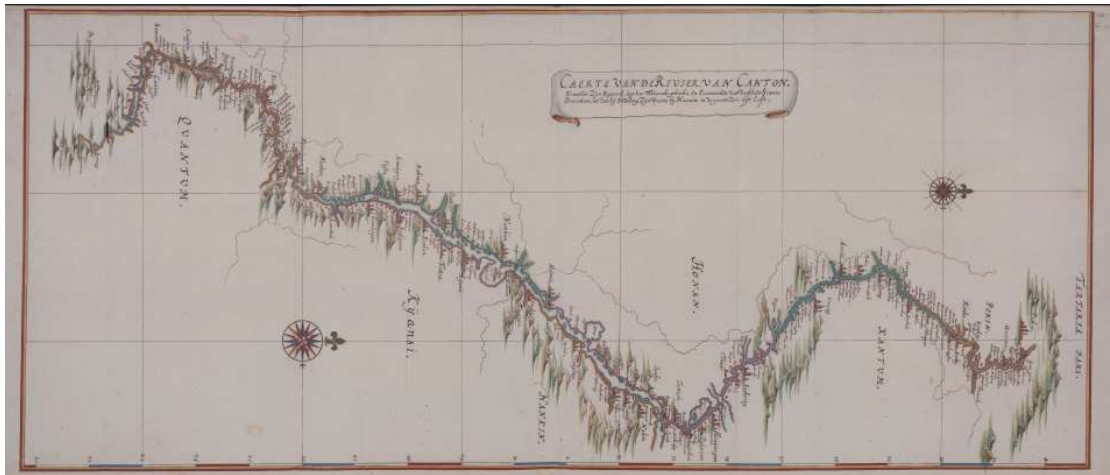
^③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頁73 – 74。

他把旅途中的各種見聞繪製出來。十年後即 1665 年，以尼霍夫之名出版的荷蘭文《荷使初訪中國記》（*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在歐洲刊行。作者在中國的見聞和繪製的民俗風情在歐洲引發了一股“中國熱”，隨後被陸續翻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英文等多個語言再版。書中所附的一張中國地圖隨之廣泛傳播。該圖以衛匡國的《中國總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為底圖，將其內容大大簡化後突出表現了從澳門到北京內河航線，也就是此次使團在華所經歷的路線。

通過版本梳理和比較，可以確認 1665 年以尼霍夫名義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荷使初訪中國記》所附中國地圖並非尼霍夫本人原作；而荷蘭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芬彭士繪製的粵道地圖寫本是目前已知最接近尼霍夫所記錄路線的地圖。^①通過芬彭士這幅地圖，我們可以瞭解到這條內河航線的真實樣貌，彌補尼霍夫遊記文字的不足。

芬彭士寫本地圖被收錄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秘密地圖集當中，高 56cm、寬 130cm。以題記方位朝向來看，該圖左南右北，而不是今天人們習慣的上北下南，為方便對照，我們在下文舉例時仍將其改為上北下南的朝向。題記以荷蘭文書寫，“粵道航線圖：發源自韃靼山脈，流經中國各省，最後匯入澳門大海”；原文“*Caerte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說明製圖者將這條連通北京與澳門的整條水道冠以“廣東的河流”的名稱，這與當時中國人以“粵道”指代該線路的習慣相符（圖 1）。^②

圖 1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



圖片來源：奧地利國家圖書館，<https://onb.digital//result/10B89019>，圖 2—8 的圖片來源相同，在此不贅。

^①楊迅凌：〈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澳門學》（澳門），第 1 期（2023），頁 162—191。

^②《粵道貢國說》，〔清〕梁廷柟：《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64—263。

芬彭士 (Joan Vinckeboons, 1617 – 1670) 長期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首席製圖師約翰·布勞 (Joan Blaeu, 1596 – 1673) 的助手，為後者的地圖進行潤色。芬彭士本人從未到過亞洲，但他作為布勞最重要的製圖合作夥伴，為後者繪製了大約 200 種、超過 450 件手繪地圖、海圖、地誌畫和平面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圖原型，作為底圖製作地圖分發給前往世界各地和荷蘭船長。這份工作讓他接觸到大量最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長、領航員的報告和草圖等一手資料。^①

尼霍夫並不是地圖學家，也不是專業的製圖師。因此在使團出發時，東印度公司要求尼霍夫攜帶 1655 年衛匡國和布勞出版《中國新地圖集》中的《中國總圖》，作為繪製地圖時的參考資料。從圖中的海岸線、島嶼的輪廓，以及水系幹流和省級行政區劃來看，芬彭士寫本捨去了粵道航線外的周邊地理信息，單純表現這條航道，圖中沒有標出經度坐標，只保留了緯度，圖面範圍是從北緯 20.8° 到 41°，剛好覆蓋整條澳門至北京的航路。該圖記錄地名約 305 個，除了“府” (Fu)、“縣” (heen)、“州” (Siu) 外，還標註了“鎮” (cing)、“衛” (wey)、“廟” (miao) 等更小一些的行政、軍事地名或宗教場所，補充了大量衛匡國地圖中所沒有的細節，同時也對衛匡國地圖中不準確的地方進行了修訂。正如尼霍夫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信中所說：

我們經過這麼多城鎮鄉村，如全寫出來會令人厭煩，因此只把沿河岸的那些城市按順序列出，把其他地方去掉……從北京回程時，我曾按韃靼人告訴我的里數用荷尺計算了旅程，發現與我們所帶的地圖並不完全相符。因此，閣下命令製作地圖時，應該改動一些地方。^②

從芬彭士圖中可見，河道兩岸密密麻麻標記了使團行經沿途的大小地名。地圖以澳門作為路線的第一站，詳細標記出從澳門到廣州，再沿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北江溯游而上抵達南雄，之後翻越約 70 華里的大庾嶺抵達贛江支流的章水，進入長江水系；隨後入贛江、鄱陽湖，沿長江順流而下，過南京、下揚州，轉入京杭運河；在駛經淮河、橫渡黃河、縱穿山東和北直隸後，最終抵達北京的內河航路。

結合莊國土翻譯的尼霍夫筆記手稿，^③筆者辨識和整理出其中約 90 個地名。尼霍夫並未沿襲前人對這些地名的書寫形式，而是盡可能地根據自己沿途所聞記錄下這些地點的名稱。這樣就把當時沿途的地名讀音較為真實地保存下來；但由於尼霍夫不懂漢語，同時許多地名是以當地方言發音，他在用荷蘭文記錄沿途各地聽到的地名時難免會走樣，這就讓今人難以識讀辨認其中的許多地名。

為展現該圖的全貌和特點，筆者根據水系和省界把這條從澳門到北京的航線分為七

^① Zandvliet, Kees. “Mapping the Dutch World Overs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1433-1462.

^② (荷) 尼霍夫 (J. Nieuhof) 原著；(荷) 包樂史 (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8。

^③ (荷) 尼霍夫 (J. Nieuhof) 原著；(荷) 包樂史 (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8。

段，擇其要者進行考釋。為便於記述，下文按照使團航線行駛方向，以“左岸”、“右岸”記錄兩岸城鎮景觀的方位。

（一）澳門至廣州段（圖2）

圖2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澳門至廣州段



該圖沒有繪製完整的珠江口輪廓，而僅僅是記錄了使團途經水路上的島嶼和海岸線。圖中澳門繪製在珠江口正中最顯著的位置，將“鹿島”（Ilhas des Vijados）繪製在澳門的東南方向，從該島的方位推測更有可能是珠江口最南端的擔竿島，不排除荷蘭人把當時的擔竿島當做了澳門附近的三灶島或高欄島。1655年衛匡國《廣東地圖》、1677年布勞《廣東沿海圖》較為準確地表現了澳門在灣區中的位置——在灣區的中段，而非底部。衛匡國廣東地圖沒有標註“鹿島”，布勞則在灣區東側底部外洋的幾個小島旁註明了“鹿島”，並註釋“擔竿島上有鹿”（Vijados at. de Leme）。1700年法國首次來華商船安菲特利特號航行到珠江口附近，大副弗羅熱繪製的地圖中把大小襟、荷包島（牛角）到高欄島間海域的大小島嶼統稱為“鹿島”（Isles des Viados），而三灶島與高欄島之間就是浪白滯。

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標註澳門的名稱為“澳門諸島”（De Eijlanden van Macao），這在其他地圖中較為罕見，但與尼霍夫手稿第8頁對澳門的稱呼完全一致。根據金國平先生介紹，在葡語文獻中也有“澳門諸島”（ilhas de Macao）的表述，其範圍對應於三灶到擔竿島間海域上的大小島嶼。尼霍夫在手稿中記到，8月14日船隊看到澳門諸島時的位置是北緯 $21^{\circ}10'$ ，水深24噶。當晚，船隊停泊在澳門最東面丘陵地帶附近的洋面上（應是松山以東海域），水深7噶。

該圖準確地記錄了澳門與大嶼山“Lamaon”的相對位置。有學者根據發音認為這是指曾作為新安縣治的“南頭城”。但實際上，明清兩代西方人在航海圖中的“Lantao”都是指大嶼山而非南頭。183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豪斯博格（James Horsburgh）根據19世紀初英國在華沿海的實測數據繪製出的《珠江航海地圖》（Chart of Choo Keang or

Canton River) 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差別。^①該圖在大嶼山上標註了大嶼山的兩個名稱：歐洲人稱其“Lantao”，中國人稱其“大澳”。使團的船隻 16 日船隊離開澳門，經大嶼山海角（手稿 Hock van Lamtao）後在一個大島前停泊（Anker）。這個大島可能是東側的內伶仃島，也可能是西側的淇澳島。對照實際地理情況，內伶仃島在南頭城的西南方向，船隊必先經過內伶仃島，才能看到南頭；而如果是淇澳島，更不可能先經過南頭城，這證實了尼霍夫手稿和地圖中的“Lamtao”或“Lamtaon”與西方人用於指代大嶼山的習慣用法一致。圖中大嶼山（Lamtaon）北部繪有一橫向的水道（深灣，也稱“深圳灣”，即今天的深圳後海），水道的北岸繪有一個城鎮，註記其名為“Samtong”（Samt-Ong），正是荷蘭文拼寫的“新安”粵語對音，此處才是南頭城真正的所在位置。水道外側繪有一個島嶼，沒有標記名稱，結合其位置必是內伶仃島無疑。

莊國土認為船隊停泊的大島是淇澳巡司所在的東澳島^②（應是淇澳島），但未給出證據。該圖在珠江口的西岸、澳門北側方向記有一個奇怪的地名“Arquirong”，這實際上是葡萄牙語“錨地”（Âncora）的荷蘭文記音。該島嶼的位置與伶仃島處於同一緯度，而比伶仃島更大。地圖中的航道兩側地名的先後順序反映了尼霍夫船隊航線的實際情況，這證明了船隊的確是在淇澳島停泊。

8 月 18 日，船隊在傍晚時進入虎門港（Haven van Heijtamon），在海灣中央水深 6.5 呎處下錨。“Heijtamon”是“虎頭門”的對音，即位於亞娘鞋島北部的虎門寨，是扼守廣省門戶八門水道中的第一門，其東側是舊缺口巡司駐地。船隊停泊後隨即有清軍兵丁乘坐小艇前來探查荷蘭人的情況。使團接待了這些兵丁，並派商務官巴隆（Hendrik Barron）跟他們上岸向當地官員說明情況。

8 月 24 日船隊沿河道逆流而上，來到東岸一個叫做“Lamme”的地方，莊國土將其翻譯為“東莞”。尼霍夫在手稿中記載，當地長官要求使臣必須上岸到府衙內詳陳來意。Lamme 在此處代指東莞應當無疑義，可能是道光《廣東通志·東莞縣圖》位於東江匯入獅子洋入海口中央的琳洲，或“琳（洲）尾”的對音。該圖在 Lamme 所在位置下方繪有一條橫向的河流，就是船隊溯游前往東莞縣治的東江南支流，亦稱“東莞水道”。由於 Lamme 這個地名，18 世紀法國人在繪製入廣水道圖時把這條水道標記為“Lamy”河。西方人認為該河流的源頭通向福建，故而有些地圖在“Lamy”河旁邊標註這條河又名“福建河”（Riviere de Fokein）。到了 18、19 世紀，英國人在珠江口航道圖中把獅子洋航道西側、橫檔以北、蓮花山以南的江鷗沙標註為“Lamee”，而江鷗沙的最底端正對東江水道匯入獅子洋的河口。儘管指稱的具體事物略有不同，但對於西方人而言，Lamme 是獅子洋航道與東莞水道交匯處的重要地標；船隻航行到此處，看到“Lamee”之後必須靠右側通過獅

^① Horsburgh, Jame. *Chart of Choo Keang or Canton River*, [London]: 1831.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複製提供，<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s/4d600t>。

^②（荷）尼霍夫（J. Nieuhof）原著；（荷）包樂史（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99 - 100。

子洋航道，或者轉右進入東莞水道。

清明時期的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是船隻進入廣州最重要的三個定位航標塔。外國商船進入獅子洋後首先看到的就是蓮花山的蓮花塔，之後可以遠遠看到黃埔島上的琶洲塔，在這兩座塔的指引下通過航道來到黃埔港，在這裏更換駁船，最後通過赤崗塔定位來到廣州城外的十三行。該圖相對準確地記錄了這三座塔的方位，並在相應位置上繪製出表示塔的“豐”字形符號。其中，“Nuchutap”是番禺蓮花山蓮花塔粵語對音的荷蘭文書寫形式，“Paototap”為黃埔島上的琶洲塔，“Schakontap”為赤崗塔；但將琶洲塔繪製和標記在廣州城南岸，赤崗塔繪製在河道中的島上，名稱因為空間不足而註記在對應位置的南岸，應該是筆誤或抄寫失誤。

（二）北江梅嶺段（圖3）

圖3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北江梅嶺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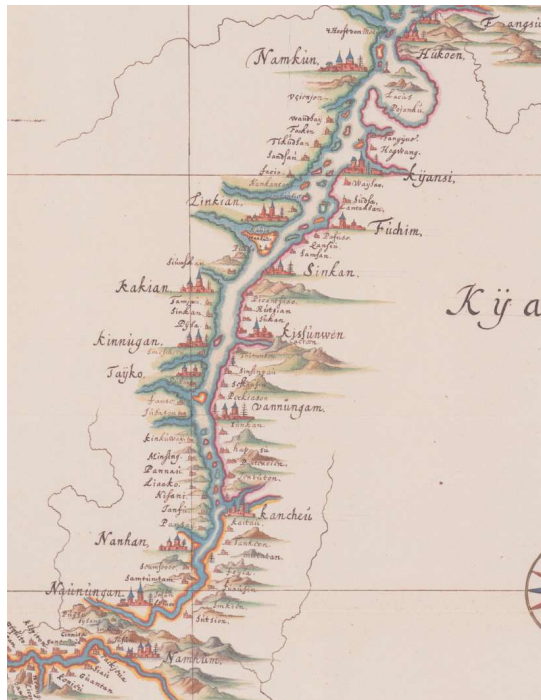
使團在廣州停留了六個月後再次出發，依次經過佛山（Foesan）、三水（Samsou），沿北江逆流而上依次經過清遠（Cinyuen）、滇陽峽（'t Gebergte van Seugwonhap）、英德（Yngtak）、望埠（Monfucko）、韶州（Suchou）、五馬頭山（Ot ma que vu）、始興（Suttieme）、黃塘驛（Guantan）、南雄（Namhum）、珠璣（Jusum）等地。該圖還以粵語對音正確標註出胥江驛（Sukon）、觀音岩廟（Kunjangsiam）、蒙湮驛（Mongley）等地。

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分別途徑珠江水系、長江水系、淮河、黃河、京杭運河等水系，僅中間粵贛交界的大庾嶺一段約35公里的路程是陸路，故而大庾嶺的這段陸路成為整條路線中最“特殊”的地方。大庾嶺又稱“梅嶺”，其上設關隘，所以也稱“梅關”，歷史可追溯至秦代。唐代張九齡始建“梅關古道”，所有南下北上的客商貨物都必須經過這條通道，自古以來就是廣東交通中原地區的要道。鄭若曾在《籌海圖編》卷十三中記載，“一逾梅嶺，即浮長江，四通八達”。也正是這個原因，梅關古道給荷蘭使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藉由尼霍夫的作品影響後人的作品。在此後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中，梅關古道在

這條貫穿中國的內河航線上格外突出，成為這條赴京粵道上最顯眼的標誌性路段。

(三) 贛江段 (圖 4)

圖 4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贛江段



經過 70 華里的陸路，使團離開廣東進入江西，來到南安縣 (Naunungan)。在南安，他們把所有貢品行李裝載到拖船上，重新登船走水路，依次經過南康 (Nanhan)、贛州 (Kancheu)、萬安 (Vannungam)。在萬安以北的河道東岸，尼霍夫記錄了彭家凹 (Peckiason)，並對此地的假山藝術讚嘆不已。使團途徑左岸的泰和 (Tayko)、吉安 (Kinnugam)，右岸的吉水 (Kissanwen)，再到左岸的白沙驛 (Pysa)、峽江 (Kakian)，右岸的新淦 (Sinkan)。在新淦以北的左岸，圖中還繪製了一個大城市臨江府 (Linkian)。臨江府明清時期全國重要的工商稅收城鎮之一，是當時江西省中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明嘉靖年間江西布政使司曾在臨江府設湖西分守道，下轄清江、新淦、峽江、新喻四縣。右岸是豐城 (Fuchim)。

再向北則是被稱為“江西城”的南昌 (Kyansi)。地圖中繪製了鄱陽湖，並用荷蘭文“Lacus Pojanhu”標明這個湖的名字。在贛江匯入鄱陽湖的地方，繪製了一個小城，註明其名稱為“吳城鎮” (Ucienjem)。靠近鄱陽湖頂部的左岸繪有一座大城“南康府” (Namkun)，即廬山所在地，府治星子縣，為交通要衝。鄱陽湖頂部右岸則繪有另一座城鎮“湖口縣” (Hukoen)，這裏也是長江的南岸。使團從此處進入長江。尼霍夫在手稿中記載，他們在這裏見到了海豚，應該是常出沒在鄱陽湖與長江交界處的白鱃豚。

（四）長江段（圖 5）

圖 5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長江段



湖口之後使團就進入了今天安徽境內的彭澤縣（Fangsu）。順治朝安徽還未設省，仍屬江蘇省。當時人們沿用明朝習慣稱江蘇為“南京”，因此尼霍夫在地圖上把省名標註為“南京”（NANKIN）。彭澤之後是右岸的東流（Tonglou）、左岸的安慶（Anhing）、右岸銅陵（Tongling）。銅陵江對面西北方向繪製了一個非常大的湖，用荷蘭文“Meer”表示這裏是一個湖，沒有繪製其源頭河流，應是指巢湖。

經過銅陵後，根據尼霍夫手稿，使團經過了一個叫做“Upun”的城堡，作者還為該城繪製了一幅水彩速寫畫。莊國土根據其位置推測可能是銅陵以東的繁昌，該城在長江右岸，建有城牆。但地圖將該城堡繪製在長江的左岸，與右岸的蕪湖（Ufu）隔江相望。實際上，圖中在長江右岸銅陵和蕪湖之間近乎中點的位置繪有一個小城鎮，標註名稱為“Tyktieng”，這個地點正是繁昌縣所在的實際位置，手寫體的“T”應是“F”的誤記。“Upun”所指顯然不會是繁昌。但同一時期蕪湖對岸的地點中找不到類似對音的地點。尼霍夫在手稿中記錄該城堡圍牆約長 1200 步，以步長 0.7 米估計，城牆周長 800 米左右，是座很小的城寨；尼霍夫說銅陵方圓步行約半小時，以此推算“Upun”約為銅陵大小的五分之一。

在蕪湖過夜後，使團次日經過了當塗縣（Teitong），再過五日，他們來到南京城（Nakim）外。B 本在南京的對岸繪製了一個小城“Jauku”，應為江浦縣。

(五) 運河江蘇段 (圖 6)

圖 6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運河江蘇段



使團在南京逗留了九日後，繼續北上。船隊在長江左岸的儀真縣 (Icieu) 轉北進入京杭大運河，而長江在此處繼續向東奔流 180 里匯入大海。手稿繪製了此處江面上的 5 個島嶼，經過三叉河後來到運河左岸的揚州府 (B:lamceu)，隨後經過邵伯鎮 (Suppa)、高郵 (Koejoebsin)、寶應 (Pojan koiu)，記錄了泛水 (Fanchu)，然後是淮安 (Hoaynegam)、清江浦 (Sinjiampu)、娘娘廟 (Neinimiao)、桃源 (Tause)、宿遷 (Suhsing)。此段河道部分與淮河重合。宿遷左側繪有一條河流匯入淮河，應是黃河，宿遷即為黃淮運三水交匯處。圖中未標註加口，但對其周邊地理環境記錄準確。沭河在此匯入運河，其西側則是山東境內的微山湖。圖不僅繪製了微山湖和湖中的島，並在微山湖東北岸繪製了一個小城，記為“微山湖 (縣)” (Ysanku)。

(六) 運河山東段 (圖 7)

圖 7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運河山東段



進入山東後，使團沿魯運河經過濟寧（Cinning）、張秋城（Kauchu）、東昌（Tachu）、臨清（Lincing）、武城（Uchien）。濟寧州，明洪武年間改府為州，屬兗州府，治所在今山東濟寧市，轄境包括今山東濟寧、嘉祥、巨野、鄆城等市縣。東昌，古平原郡，明初改東昌府，治所在聊城縣，轄境相當今山東聊城市及高唐、茌平、冠縣、莘縣等地。臨清，明弘治年置臨清州，屬東昌府。臨清關是運河的重要稅關，位於運河西岸，始建於明宣德年間。明萬曆年間，臨清關年徵收船料商稅銀八萬餘兩，居全國八大鈔關之首，佔全國課稅額的四分之一。離開武城後，運河經過北直隸的故城（Koecien）。故城，屬北直隸河間府，東鄰山東省，西南至山東武城縣六十五里。運河流經故城後，又一次進入山東，縱穿德州城（Sacheu）後再入北直隸。

（七）運河北直隸段（圖 8）

圖 8 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局部：運河北直隸段



使團進入北直隸，沿運河經過東光（Tonquan）、泊頭鎮（Potau）、滄州（Sangloo）、興濟（Sinky）。泊頭鎮，初興於隋唐，因運河漕運而得名，有泊頭鎮巡司，並置新橋驛，俗名泊頭驛。明清時期的滄州是運河重要的漕運碼頭和商業中心。滄州歷史上又稱長蘆，明代以長蘆鎮為治地，又因盛產“長蘆鹽”而聞名全國。圖中的“Sangloo”即為“長蘆”的對音。興濟鎮在滄州以北運河右岸，順治六年（1649）併入青縣。尼霍夫手稿記載，興濟地處航運要衝，昔日頗具盛名，但因為韃靼戰事已被破壞殆盡，人煙稀少。

使團繼續北上，經過青縣（Kinko）、靜海縣（Sinkey）、天津（Tiensiu）、河西務（Gosiwoc）。靜海縣，今天津靜海區。運河到靜海獨流北行到天津三岔河口，然後轉潞水流向通州，最後抵達北京。天津的三岔河口因此成為漕運樞紐，而天津也成為運河漕運的重鎮。地圖繪製出三岔河口的形態。天津於明永樂二年（1404）設衛築城，初設備兵使者於此，其後遼左多事，增置重臣，屯列將領，為京師東面之巨鎮。河西務自元代就是京

畿要衝，漕運咽喉；明洪武二年（1369）設河西水驛；宣德四年（1429）設河西務鈔關；清康熙四年（1665）河西務關遷至天津北大關。

此後，使團到達位於張家灣（Saukauwan）前的皇家港口。張家灣是盧溝河與白河交匯處，明代設有張家灣巡司，並移和合驛於此；清置漕運通判，有都司駐防。儘管運河可以由通惠河直抵北京城內積水潭的漕運總碼頭，但按照要求，使團人員必須下船改由陸路入京，所有運往北京的貢物也必須在此處或通州從船上卸下，用驢車由陸路送到北京。使團經過運河左岸的通州（Gonsiou）後抵達北京（Pekin）。該圖繪製內容至此結束。

儘管尼霍夫地圖手稿被秘藏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但他的遊記和另一張“改繪”的地圖由他的哥哥亨利整理出版。該書在歐洲大獲成功，成為隨後數十年來歐洲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和地理景觀的重要知識來源。書中的粵道圖也隨之傳播，不僅讓西方人對中國的地理狀況有所瞭解，更重要的是強化了歐洲人對中國朝貢制度的認知——要到中國貿易，就要獲得北京的准許；要去北京，就要走從澳門到北京這條唯一合法的貢道。

儘管亨利·尼霍夫的地圖不如芬彭士粵道圖那樣真實還原了明清時期這條重要的內河交通要道，甚至存在許多錯誤，但它同樣強調出這條通道在明清中外交往和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在隨後近150年間，亨利·尼霍夫這張重點表現外國使團訪華入京內河航線的中國地圖成為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的一個重要來源，不斷湧現出相關的地圖作品。

三、歐洲所繪粵道地圖的譜系及其特點

古地圖的譜系研究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古地圖受到製圖技術發展的限制，缺乏或甚至沒有準確的經緯數據、比例尺、投影和符號系統，往往與實際測繪的現代科學地圖有很大差異。如果將古地圖的圖面信息與現代地圖進行簡單比對和解讀，很可能會得到錯誤的結論。因此，古地圖的分析和研究，須要放到其發生學的背景下來進行考察，對地圖繪製的背景、目的、繪製內容的形成、發展和演化進行分析，同時必須結合繪圖時的製圖學史和技術條件，瞭解地圖製作、傳播、再生產過程中知識與觀念的流傳與變化。為得到相對可靠的分析，避免對單張地圖作品的過度解讀，就有必要整理相同或相近譜系的古地圖，發現其中現象、特徵和規律。正如鍾翀提出的，古地圖譜系必須考察其發生學的共同起源，並且具有一定數量的樣本，同時還應考察製圖內容、觀念、尺度上的可比性。^①

根據筆者的初步整理，歐洲所繪粵道地圖大致可以分為五個主要譜系。分別是（一）尼霍夫譜系、（二）馬嘎爾尼譜系、（三）范罷覽譜系、（四）阿美士德譜系、（五）入華耶穌會士譜系。上述五個譜系外，還有其他一些雖然不是以粵道為主要表現內容，但在圖中以突出或顯眼的方式表現出這條通道的西方地圖。

^①鍾翀：“形象史學視野下的輿圖與邊疆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昆明：雲南大學，2023年10月。

（一）尼霍夫譜系粵道圖

（1）尼霍夫粵道地圖手稿

尼霍夫在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提到，他向董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的旅行報告和一張中國地圖。^①1984年，包樂史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尼霍夫的原始手稿，^②其中就有他繪製的插圖，但地圖卻不知所終。但這張地圖的存在性應該可以確認。根據目前已知地圖與尼霍夫手稿所記錄的行程進行比對，我們大致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個地圖的傳播路徑：尼霍夫本人繪製的地圖手稿交給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後者將這張地圖交由該公司的製圖師布勞及其助手芬彭士以更專業的方法進行地圖繪製和潤色，並被收藏到該公司的秘密地圖集當中。東印度公司的歷任製圖師們接觸到這張手稿，在其基礎上進行再創作，繪製出若干衍生作品。約翰·尼霍夫在離開阿姆斯特丹前把他所使用的原始記錄留給了他的哥哥亨利·尼霍夫，後者將這些材料進行編輯、再創作並最終出版。由於亨利的印本流傳很廣，衍生出其他地圖作品。泰弗諾可能在尼霍夫完成正式報告和地圖之前拜訪過約翰·尼霍夫或亨利，並見到甚至將報告和地圖抄錄了一份。因此我們可以把尼霍夫譜系粵道圖再分為兩個子譜系：東印度公司內部流傳的芬彭士譜系、歐洲市場上流傳的亨利譜系。

（2）芬彭士《粵道航線圖》手稿

芬彭士譜系的第一件作品。荷蘭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芬彭士繪製秘密地圖手稿，高56cm、寬130cm。以題記方位朝向來看，該圖左南右北，而不是今天人們習慣的上北下南。題記以荷蘭文書寫，“粵道航線圖：發源自韃靼山脈，流經中國各省，最後匯入澳門大海”；^③原文“*Caerte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說明製圖者將這條連通北京與澳門的整條水道冠以“廣東的河流”的名稱，這與當時中國人以“粵道”指代該線路的習慣相符。該圖前文已做詳細介紹，不再贅述。

^①（荷）尼霍夫（J. Nieuhof）原著；（荷）包樂史（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3。

^②（荷）尼霍夫（J. Nieuhof）原著；（荷）包樂史（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1。

^③Vinckeboons, Joan. *Caerte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 Nemende Zijn Beginsel, Úijt Het Tartarische Gebercht, en Passeerende Door Verfche de Sineese Provintien, Tot Dat Hij en Deling Zijn Water, Bij Macouw in de Groote Zee Úijt Loft*. VOC Secret Maps, Manuscript, c.1668. Provenanc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389030-F.K. KAR MAG. URL: <https://onb.digital/result/10B89019>.

(3) 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圖9)

圖9 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圖書館。

亨利譜系的第一件作品。地圖高 37.5cm，寬 42cm，右下角的渦卷紋飾上分別用荷蘭文、法文、拉丁文、德文書寫地圖題名。^①題名下繪有長 50 刻度的比例尺，以荷蘭文註明“每度 15 荷哩”。類似大航海時代各國表示距離的單位“里格”，荷哩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數值。該圖收錄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現今的中國皇帝：1655 年至 1657 年穿越中國山川，廣東、江西、南京、山東和北京的難忘經歷，簡潔而準確地描述中國的城市、村莊、政府、科學、工藝、習俗、宗教、建築、服飾、船舶、山川、莊稼、動物等，以及中國人抵抗韃靼人的戰爭：150 幅描繪中國生活的圖畫》（*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中。^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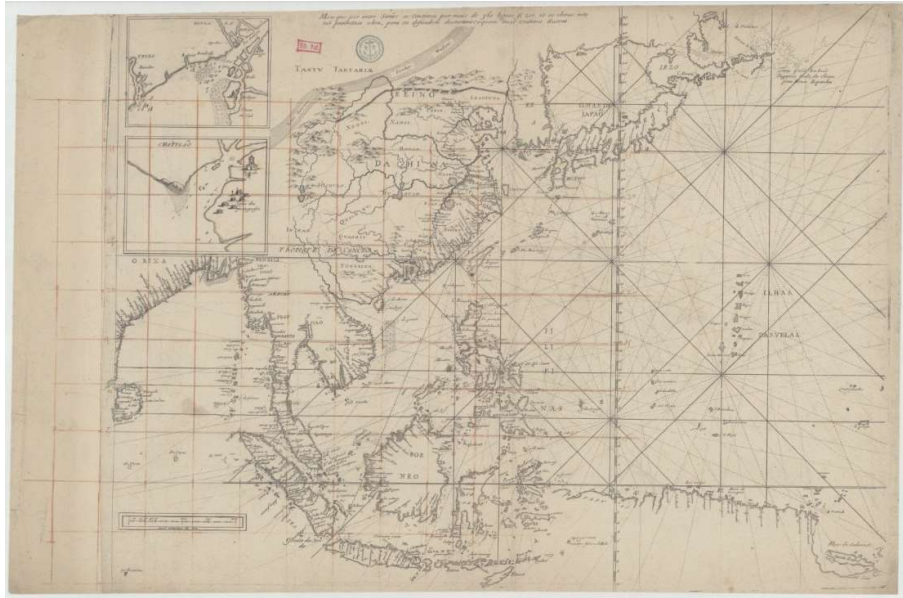
該圖是此圖系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地圖隨書發行，先後出版荷蘭文版 1665 年版、1670 年版、1693 年版；法文版 1665 年版；德文版 1666 年版、1669 年版；拉丁文版 1668 年版；英文版 1669 年版、1673 年版。在各語種的版本中，地圖內容幾乎沒有改變，保留了圖中的文字，只在渦卷紋飾或比例尺方面有些小的調整。

^① Reys-Kaerte vande Ambassade der Nederlandse Oost Indise Compagnie door China aen den Grooten Tartarsen Cham.

^② Nieuhof, Johannes.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Jacob van Meurs, 1665.

(4) 泰弗諾《東印度及西太平洋航海圖》（圖 10）

圖 10 泰弗諾《東印度及西太平洋航海圖》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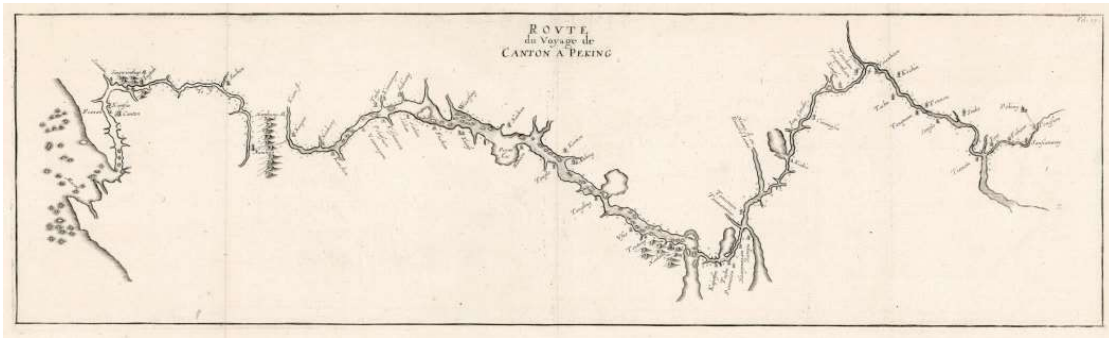
亨利譜系。在泰弗諾（Melchisedec Thevenot）《有關各種奇妙旅行的記敘》（*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以下簡稱《奇妙旅行》）1664年版的第二卷中，有一幅《東印度及西太平洋航海圖》（*Carte Générale des Mers de Chine Comprend Toutes les Îles du Grand Archipel d'Asie*）。^①該圖高 51cm，寬 77cm，折疊後收錄在書中。地圖繪製從西向東由斯里蘭卡到日本群島範圍內的東亞、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區域。據泰弗諾在書中的說明，這是根據意外發現的葡萄牙航海圖手稿為底圖製作的地圖，作者是葡萄牙著名的製圖師特謝拉（João Teixeira Albernaz I）。地圖具有很明顯的葡萄牙航海圖的特徵，圖中海洋的區域繪製了許多縱橫交錯的恒向線，陸地上則沿海岸線垂直方向密密排列着重要的航海地名，絕大多數情況下內陸都留出大塊空白。但在此圖中，中國內陸地區則參照衛匡國《中國總圖》繪製出黃河、長江、珠江以及長城和橫貫西北的大沙漠，中國內陸沒有標註其他任何城鎮名稱，卻繪製了從澳門到北京的這條內河航線，密密麻麻地標註出航線上的地名。

航線最南端的澳門（Macao）到最北端的北京（Pekin），共標記 49 個地名。與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相比，地名和內容被大大簡化，只記錄了“府”、“州”、“縣”一級的地名。此外，兩者同樣錯誤地把長江繪製成注入巢湖。從錯誤的一致性和地名註記形式來看，此圖應屬亨利譜系。

^① Thevenot, Melchisedec. *Carte Générale des Mers de Chine Comprend Toutes les Îles du Grand Archipel d'Asie*. Provenanc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E SH 18 PF 181 P 11, URL: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2276773>.

(5) 泰弗諾《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線圖》(圖 11)

圖 11 泰弗諾《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線圖》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收錄於法國遊記作家泰弗諾於 1663 – 1696 年間陸續出版的《奇妙旅行》1666 年版第三卷。^①該卷出版了翻譯成法文的尼霍夫中國遊記。該卷書最初於 1664 年出版，問世的時間甚至比亨利 1665 年出版的尼霍夫中國遊記還早了一年。泰弗諾強調說，他的版本是根據尼霍夫的手稿製成的。根據尼霍夫的自述，他在 1658 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三個月期間，“每天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來拜訪我，對我從中國帶回的筆記和素描大感興趣，並向我索看和討論這些筆記和速寫”。^②1658 年泰弗諾 38 歲，不確定是否這一年他拜訪了尼霍夫，或是在此後他拜訪了尼霍夫的哥哥亨利，泰弗諾看到了尼霍夫遊記的手稿和地圖。有意思的是，在 1664 年初版第三卷中，只有尼霍夫中國遊記的文字和插圖，卻沒有地圖。直到 1666 年第三卷再版時，才加上了這幅《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線圖》(Route du Voyage de Canton a Peking)，被添加在《奇妙旅行》第三卷中關於 1655 – 1656 年荷蘭使團訪華行程的章節中，說明這是一張增補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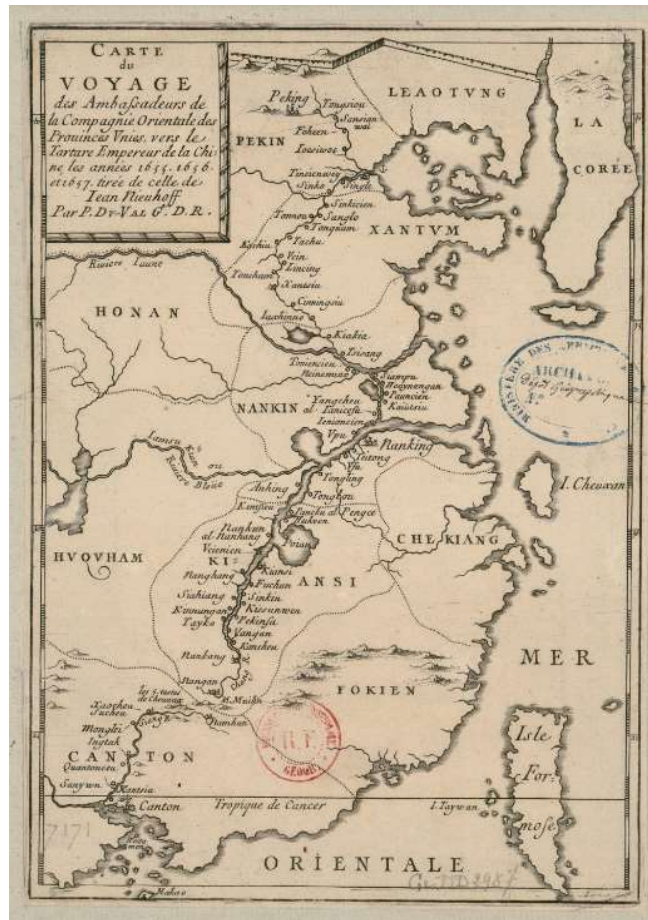
全圖單純表現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共標註了 57 個地名。其書寫形式與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基本相同，顯示出明顯的相關性。但其河道的形態、輪廓和走勢卻與芬彭士《粵道航線圖》手稿更加接近。同為泰弗諾的作品，在《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線圖》標記，但沒有出現在《東印度及西太平洋航海圖》的地名包括：佛山“Foezan”、萬安“Vannungam”、吳城鎮“Woetsing”、鄱陽湖“Poyan Lac”、湖口“Hukoen”、“Kontiou”、當塗“Teytong”、桃源“Tauienien”等，同時還在宿遷西側河道中寫明“Hoang fl. Ou Riviere Iaune”，表示黃河在此處與淮河交匯。這說明泰弗諾不僅採用了不同來源的知識，還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說明。

^① Thevenot, Melchisedec.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é publiées, et qu'on a traduit ou tiré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ois, Espagnols, Allemands, Portugais, Anglois, Hollandois, Persans, arabes & Autres Orientaux*. Chez Thomas Moette libraire, rue de la Bouclerie, à Saint Alexis, 1666-1696.

^② (荷) 尼霍夫 (J. Nieuhof) 原著；(荷) 包樂史 (L.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3。

(6) 杜瓦爾《荷使出訪韃靼中國皇帝路線圖》（圖 12）

圖 12 杜瓦爾《荷使出訪韃靼中國皇帝路線圖》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亨利譜系。皮埃爾·杜瓦爾（Pierre Duval，1619—1683）是 17 世紀法國重要的製圖師和地理學家，師從桑松（Nicolas Sanson），曾擔任“國王的地理學家”。他於 1677 年出版的《現代路線與行程地圖》（*Cartes Pour les Itinéraires et Voïages Modernes*）收錄了當時歐洲最新的海上或陸地航線，成為這個時期探險家、旅行者和學者的重要參考。書中收錄了改繪的尼霍夫粵道圖，^①記錄了沿岸 70 個地名。從文字註記形式和圖像內容初步判斷，該圖應是由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改繪而來。由於受到圖書尺寸的限制，地圖高 23cm、寬 16.5cm；改繪時將原圖的範圍縮減到從西向東從洞庭湖到朝鮮半島的區間，剛好完整表現了尼霍夫繪製的粵道圖。

^① Duval, Pierre. *Carte du Voyage des Ambassadeurs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Unies vers le Tartare, Empereur de la Chine, Les Années 1655, 1656 et 1657, Tirée de Celle de Jean Nieuhoff*. 1677, Provenanc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PL GE DD-2987 (7171). URL: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963040r>.

(7) 佚名《中國海及海岸圖：從婆羅洲、老萬山到南京及日本》（圖 13）

圖 13 佚名《中國海及海岸圖：從婆羅洲、老萬山到南京及日本》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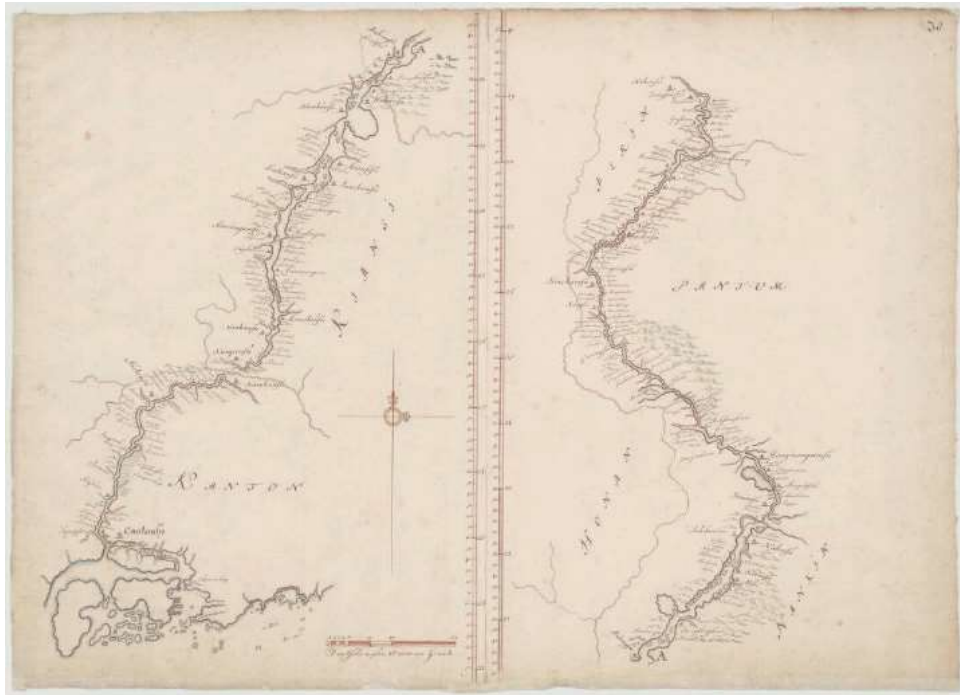
芬彭士譜系。這是一張 17 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圖手稿，^①藏於荷蘭國家檔案館“萊烏佩特藏”，編號 290。1867 年，萊烏佩將荷蘭東印度公司各種早期檔案中的外國地圖匯集到一起，編輯了一份《國家檔案館藏 1584 – 1813 年外國地圖目錄》，收錄了大量手稿地圖、圖畫以及印刷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圖檔案。該集合現在被稱為“萊烏佩特藏”（Leupe Collection），簡稱“VEL”和“VELH”（補遺），其中部分已經數字化。

該圖具有明顯的航海圖特徵，除圖中的羅經線為印製外，其他部分均為手繪或書寫。圖面沒有題記和繪製者的簽名，題名為後加，繪製了從西南至東北由新加坡到日本四國島的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區域。該圖較為準確地繪製出中國海岸線和主要島嶼的形狀，海岸線垂直寫滿了地名，內陸幾乎全部留白，僅僅標記出“China”和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四個省名，但卻以非常顯著的方式繪製出一條縱貫中國南方的河道。河道被標記為“廣東河”（Rio van Canton），亦即粵道航線，從南向北依次標註出澳門、南頭角、廣州，清晰繪製出北江與贛江的對應關係，刻劃出大庾嶺是粵道航線僅有的陸路段的特徵。河道只繪製到贛江頂部的鄱陽湖。目前所知的信息暫時無法確認該圖的成圖時間，或是否與尼霍夫粵道圖有關；但從製圖風格和華南海岸線的繪製形態來看，該圖與約翰·布勞同一時期的作品較為接近。

^① Anonymous. *Kaart van de Chineesche Zee en Kust, van Straat Drioens tot Nanquin, en de Eilanden van Borneo tot Japan en de Ladronez*. Manuscript, Provenance: Nationaal Archief, VEL 290. URL: 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en/research/archive/4.VEL/invnr/290/file/NL-HaNA_4.VEL_290.

(8) 佚名《廣東河地圖》（圖 14）

圖 14 佚名《廣東河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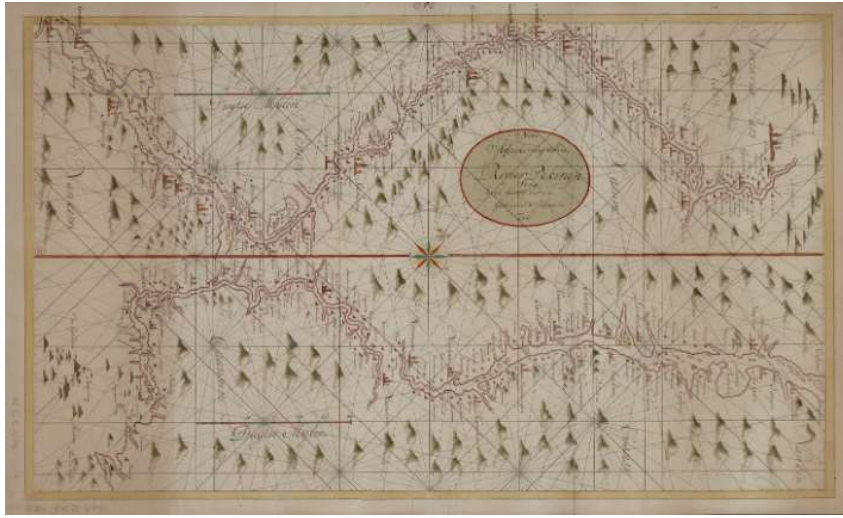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

芬彭士譜系。該圖為佚名寫本地圖，與前圖同樣被收錄在荷蘭國家檔案館“萊烏佩特藏”，編號 275。圖面沒有題記，萊烏佩將其命名為《廣東河地圖：從珠江口到安慶，從安慶到北京》（*Kaart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 van den Mond tot Anhingfu, van Anhingfu tot Nekinfu*）。^①地圖繪製在紙上，圖面內容與芬彭士《粵道航線圖》手稿比較接近，一樣標有詳細的經度刻度，但地名註記有些不同。由於芬彭士原圖太高，為方便閱讀，製圖者把地圖從上至下中分成兩段，將兩段左右並排：左邊是澳門至安慶段，右邊則是安慶到北京段。製圖者把北直隸標註為“北京省”（Pekin），但卻把北京城的名稱錯誤地寫成“南京府”（Nekinfu），說明製圖者不瞭解中國的情況，甚至將最重要的城市名稱寫錯。

^① Anonymous. *Kaart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 van den Mond tot Anhingfu, van Anhingfu tot Nekinfu*. Manuscript, Provenance: Nationaal Archief, VEL 275. URL: 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onderzoeken/archief/4.VEL/invnr/275/file/NL-HaNA_4.VEL_275.

(9) 佚名《精繪印度洋至中國北京航線圖》（圖 15）

圖 15 佚名《精繪印度洋至中國北京航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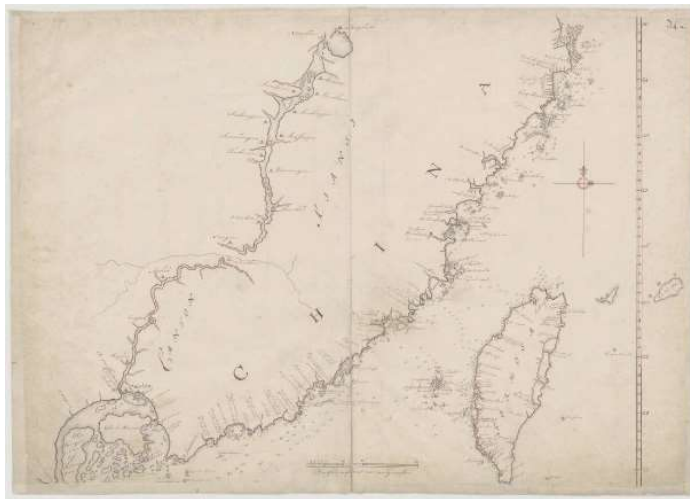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芬彭士譜系。該圖為佚名寫本地圖，高 105cm、寬 63.5cm，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繪製內容與文本註記與芬彭士《粵道航線圖》手稿十分接近。與前圖相似，製圖者把地圖從上至下中分成兩段，將兩段左右並排，不過左右剛好調換：右邊是澳門至安慶段，左邊則是安慶到北京段。左邊空白處寫有題記。^①全圖繪有羅經線，標有比例尺和經緯網格，但未給出具體經緯讀數。該圖改正了芬彭士《粵道航線圖》註記文字的若干筆誤，應是在芬彭士《粵道航線圖》基礎上的改繪版本。

(10) 佚名《中國海及海岸局部圖：從浪白滯到舟山群島》（圖 16）

圖 16 佚名《中國海及海岸局部圖：從浪白滯到舟山群島》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

^① Anonymous. *Nette Afteekening van de Rivier Pekingh in Sina Heel Groot Bestek Geleegen in de Indische Zee*, 17th century. Manuscript, Provenanc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E B-12948 (RES). URL: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7200250z>.

芬彭士譜系。該圖為佚名寫本地圖，^①與前圖同樣被收錄在荷蘭國家檔案館“萊烏佩特藏”，編號 272。地圖繪製在紙上。圖面沒有題記，內容與前述第 275 號藏品十分接近，但僅繪製了從澳門到鄱陽湖段的粵道，並繪製出從珠江口到舟山群島以及台灣在內的中國海岸線。該圖標有詳細的經度刻度，增加了海岸線的地名註記。

(11) 范德阿《大中華帝國所有省份、城市、村鎮和河流的精確地圖》（圖 17）

圖 17 范德阿《大中華帝國所有省份、城市、村鎮和河流的精確地圖》



圖片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亨利譜系。本圖由彼得·范德阿（Pieter van der Aa, 1659—1733）出版，製圖時間不明，根據收藏機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編目數據約為 1700 年。范德阿是荷蘭出版商，以製作地圖和地圖集聞名，但也盜版印刷了許多暢銷書和插畫書籍。范德阿的許多作品以法語和荷蘭語製作。圖右的題記即以法語書寫，^②並說明該圖由尼霍夫繪製，是荷蘭使團從巴達維亞到北京的旅途中繪製。地圖繪製範圍和內容完全照抄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重點繪製了粵道航線，重新製作了題記和渦卷紋飾，繪製了兩名荷蘭使臣覲見中國皇帝的圖像，同時參考衛匡國中國總圖補充註記了各省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名稱。

^① Anonymous. *Kaart van een Gedeelte der Chinesche Zee en Kust, van Punta Lampa cao tot de Overveens Eilanden, het Eiland Formosa enz.* Manuscript, Provenance: Nationaal Archief, VEL 272. URL: 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onderzoeken/archief/4.VEL/invnr/272/file/NL-HaNA_4.VEL_272.

^② J. Nieuhof, and P. V. D. Aa (c.1700). *Carte Exacte de Toutes les Provinces, Villes, Bourgs, Villages et Rivières du Vaste et Puissant Empire de la Chine: Faite par les Ambassadeurs Hollandois dans leur Voyage de Batavia à Peking.* [Leiden, Netherlands: s.n., 170-?] [Map] Provenanc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87691057/>.

(12) 莫爾《中華帝國與日本地圖》(圖 18)

圖 18 莫爾《中華帝國與日本地圖》局部：澳門至鄱陽湖(左)、鄱陽湖至北京(右)



圖片來源：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大衛拉姆齊古地圖特藏。

這是一張 18 世紀上半葉流傳甚廣的英文地圖，^①主要表現中國和日本的自然與行政地理狀況。圖中以明顯的手法繪製出從澳門到北京的粵道航線，應是受亨利譜系的影響。製圖者赫爾曼·莫爾（Herman Moll，？—1732）早年經歷不為人所知，只知道他 17 世紀中葉出生在德語地區或荷蘭，但他作為製圖師的職業生涯則一直是在英國。該圖收錄於作者的《小地圖集》（*Atlas Minor*），全書收錄了 62 張世界各國的地圖，以英文註記，在倫敦出版。此處使用的是該書第 3 版，出版時間約為 1736 年。此時莫爾已經去世，說明該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馬嘎爾尼譜系粵道圖

1793 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出使中國，在清廷的破例優待下，讓使團從澳門乘船由海路直抵天津入京，但回程時仍然大致沿運河南下，經粵道返回澳門登船回國。不同之處在於，馬嘎爾尼使團返回時通過京杭運河抵達揚州後，沒有轉入長江，而是繼續沿運河經瓜洲、鎮江府、丹陽縣、常州府、無錫縣、蘇州府，進入浙江省嘉興府。隨後經石門抵達杭州府，沿錢塘江、富春江，途經富陽縣、桐廬縣、嚴州府，向南入蘭江，在蘭溪縣轉西入衢江（信安江）。隨後經過衢州府，到常山縣後改由陸路，經草坪關進入江西省廣信府（今上饒）玉山縣。這裏有發源於浙贛兩省交界懷玉山的信江，使團得以繼

^① Moll, Herma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sland of Japan, Agreeable to Modern History." *Atlas Minor: Or A New and Curious Set of Sixty-two Maps, In Which Are Shewn all the Empires, Kingdoms, Countries, States, In All the Known Parts of The Earth; with Their Bounds, Divisions, Chief Cities & Towns, the Whole Composed & Laid Down Agreeable to Modern History*. 3rd ed. London, Printed for Thos. Bowles in St. Pauls Church Yard & John Bowles at the Black Horse in Cornhill, c.1736. Retrieved from David Rumsey Collection,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s/dx-4acb>.

續他們的水路航行。沿信江經貴溪縣、安仁縣，到達餘干縣。餘干縣在鄱陽湖的東南岸，西連南昌府進入贛江，從此回到原來尼霍夫所記載的路線。

（1）巴羅《海圖》、《簡圖》手稿三幅

大英圖書館藏有 1793 年馬嘎爾尼使團訪華行程繪製的若干套地圖、風景、人物手稿圖集，此地圖所在的圖集中含有 80 幅各類圖像資料，主要由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約翰·巴羅爵士（Sir John Barrow）等人繪製，其中的地圖大多出自巴羅之手，該館館藏號以“Maps 8 Tab.c.8.”開頭。其中《黃海與中國內陸局部海圖》（A Chart of the Yellow Sea and Part of the Continent of China）、^①《從熱河陸路至北京、北京水路至杭州府行程簡圖》（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Gehol in Tartary by Land to Pekin, and from Thence by Water to Hang-tcheou-foo in China）、^②《從杭州府到廣州府行程簡圖》（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Hang-tcheou-foo to Quangtcheou-foo or Canton），^③後兩圖的比例尺都是 1:1,900,800（1 英寸：30 英里），着重繪製了從北京到廣州和澳門的內河航道路線。該套手稿圖集中還收錄有《山東沿海圖》（A Sketch of the Coast round the Promontory of Shan-tung）、《北京至熱河陸路行程簡圖》（Sketch of the Pei-ho or White River and of the Road from Pekin to Geho）、《大嶼山北部海灣及島嶼示意圖及水深》（Sketch of the Bay and Islands, North of Lantao, with the Soundings），以及廣州西班牙商館首任大班阿格特（Manuel de Agote）繪製的《澳門港城圖》（Plano de la Ciudad de Macao）和《澳門至廣州水道圖》（Plano del Rio por el Qual se Navega con Embarcaciones Menores Entre Macao y Canton）。^④這些作品多數於 1797 年出版在喬治·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傳播甚廣。

巴羅《黃海與中國內陸局部圖》手稿高 71cm，寬 51cm，題記說明此圖以麥卡托投影法繪製中國黃海和局部內陸，黃海部分按照日期記錄了使團來華乘坐的“印度斯坦號”和“獅子號”每天的行經路線和測得的水深，而內陸部分則繪製了使團回程時途經清帝國內陸四通八達的河流與運河。圖中簡要地標記出途經的河道名稱，以及沿途“府”一級的地名，在江西南安府和廣東南雄府之間用一條紅色線段連接，表明這裏是廣東和江西之間的陸路通道，即大庾嶺。巴羅在《從熱河陸路至北京、北京水路至杭州府行程簡圖》、《從杭州府到廣州府行程簡圖》兩圖中註記了較多的地名，同時在使團途經沿線位置還寫有不少大段的描述性文字。《從杭州府到廣州府行程簡圖》還簡要地繪製了原本粵道往返北京所規定的從揚州府、南京到鄱陽湖的長江路線。

^①為方便敘述，本文簡稱《海圖》，後兩圖則稱《簡圖》。Barrow, John. *A Chart of the Yellow Sea and Part of the Continent of China*. 1794. British Library, Shelfmark: Maps 8 TAB.c.8.65.

^②Barrow, John. *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Gehol in Tartary by Land to Pekin, and from Thence by Water to Hang-tcheou-foo in China*. 1793. British Library, Shelfmark: Maps 8 TAB.c.8.66.

^③Barrow, John. *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Hang-tcheou-foo to Quangtcheou-foo or Canton*. 1793. British Library, Shelfmark: Maps 8 TAB.c.8.67.

^④De Agote, Manuel. *Plano del Rio por el Qual se Navega con Embarcaciones Menores Entre Macao y Canton*. 1792. British Library, Shelfmark: Maps 8 TAB.c.8.71.

(2) 巴羅《海圖》、《簡圖》印本三幅(圖19)

圖19 巴羅《海圖》、《簡圖》印本三幅



圖片來源：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

這三張圖收錄在1796年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形式與巴羅的手稿接近，但製圖者補充了若干地名和細節。《海圖》(A Chart, on Mercator's Projection, Containing the Track and Soundings of the Lion, the Hindostan and Tenders, from Turon-Bay in Cochin-China to the Mouth of the Pei-Ho River in the Gulf of Pe-Tche-Lee or Pekin)^①題記中說明該圖採用墨卡托投影記錄“獅子號、印度斯坦號從交趾支那土倫灣^②到北直隸灣白河口和北京行經路線及水深”。巴羅《海圖》印本與其手稿一樣完整繪製出使團從北京出發，經京杭大運河到杭州，再通過錢塘江支流抵達浙江與江西交界的常山縣，經一小段陸路轉運後到達江西的玉山縣，再通過廣信河到鄱陽湖，由此轉入贛江水系，回到傳統的粵道航線上，最後抵達廣州和澳門。不同之處在於，印本補充了路線上的若干“府”、“縣”名稱，並將原先手稿的繪製範圍的左側從緊挨着澳門的東經113°擴展到土倫灣東經108°，從而繪製出完整的海南島以及這一區域內的中國內陸省份。兩幅《簡圖》印本^③與手稿的情況與上述《海圖》相似，將上述從北京到澳門的內河航線從杭州府處分成兩段，印本分別補充了途經各省的名稱和省界輪廓，並繪製出沿途的山脈與河道支流情況，但補充註記的文字不多，說明當時製圖者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多的關於這條路線的信息。

^① Barrow, John, and Benjamin Baker. "A Chart, on Mercator's Projection, Containing the Track and Soundings of the Lion, the Hindostan and Tenders, from Turon-Bay in Cochin-China to the Mouth of the Pei-Ho River in the Gulf of Pe-Tche-Lee or Peki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by Sir George Staunton, George Nicol, 1796. Provenanc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MAP RM 3964, <https://nla.gov.au/nla.obj-775666370/>.

^② 即今越南峴港灣，古稱“沱灤”，因法語讀音又稱“土倫灣”。

^③ Barrow, John, and Benjamin Baker. "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Zhe-Hol in Tartary by Land to Pekin and from Thence by Water to Hang-Tchoo-Foo in China."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by Sir George Staunton, George Nicol, 1796. Provenanc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MAP RM 5015, <https://nla.gov.au/nla.obj-779970303/>; Barrow, John, and Benjamin Baker.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Hang-Tchoo-Foo to Quang-Tchoo-Foo or Canton in China."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by Sir George Staunton, George Nicol, 1796. Provenanc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MAP RM 5014, <https://nla.gov.au/nla.obj-775665495/>.

（三）范罷覽譜系粵道圖

1794年，荷蘭最後一次派遣使團（德勝使團，Isaac Titsingh Embassy）赴京為乾隆皇帝祝壽和朝貢，^①此次使團的副使范罷覽（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於1797—1798年在美国費城以法文出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訪華紀實：1794—1795》（*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 1795*），其中附有使團在華路線的地圖。此次使團赴京表面上的目的是向乾隆皇帝慶賀六十大壽，使團在廣州等候了兩個月獲准前往北京，但此時距朝廷要求使團到達北京的時間僅剩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使團沿原有粵道路線到達南昌府後改走陸路，趕在規定時間內抵達北京。第二年（1795）荷蘭被法國佔領，1810年被併入法國直至1815年才再次復國；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難以維繫，於1799年12月31日被解散；德勝使團也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後一個訪華使團。

（1）范罷覽《中國地圖：荷蘭東印度公司1794—1795年訪華使團行程》（圖20）

圖20 范罷覽《中國地圖：荷蘭東印度公司1794—1795年訪華使團行程》



圖片來源：Boston Rare Maps。

該圖（*Carte de la Chine Dressée pour Servir au 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 1795*）^②收錄在范罷覽以法文出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訪華紀實：1794—1795》一書中。題記以法文、

^①林發欽：〈帝國斜陽：荷蘭使臣德勝使華考述〉，《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3），頁164—174；Andrade, Tonio. *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Carte de la Chine Dressée pour Servir au 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 1795 (A Map of China Designed for the Voyage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 1794 & 1795.” *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 by 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Moreau de Saint-Méry, 1797-1798. Access from <https://bostonraremaps.com/inventory/1797-houckgeest-china/>.

英文雙語書寫。地圖根據唐維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改繪的《皇輿全覽圖》為底圖，以穿過北京的經線為零度經線，繪製了從南至北由廣東海陵島到熱河與秦皇島，包括整個山東半島在內的中國東部地區。圖中用雙虛線繪製出德勝使團從廣州往返北京行程的路線，沒有以文字註釋地名，但用大、小寫字母和數字標記出路線經過的主要地點：大寫字母表示“府”一級較大的城市，小寫字母和數字則表示較小的地名。范罷覽在該書第一卷專門有“行程”一章，按照日期列出使團行程路線上的大小地名，並說明是給讀者理解地圖之用。

(2) 范罷覽《荷蘭使團 1794 至 1795 年往返北京路線圖》（圖 21）

圖 21 范罷覽《荷蘭使團 1794 至 1795 年往返北京路線圖》



圖片來源：杜克大學圖書館。

該圖（Route of the Dutch Embassy to and from Peking in 1794-1795）^①收錄在 1798 年在倫敦出版的范罷覽《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訪華紀實：1794 — 1795》英文翻譯版中。該圖在法文版附圖的基礎上，簡化了使團路線以外的水系支流，但對路線途經的湖泊進行了補充，同時將書中“行程”一章裏面的地名加入圖中，大大方便了讀圖。該圖同樣以穿過北京的經線為零度經線，同時註明北京位於格林尼治的東經 116°24'15”，表明製圖者的英國身份。製圖者還在河道上進行註記，例如長江段寫明“Usual Route to Peking”等。值得注意的是，製圖者在山東臨清位置寫有一段話，“大運河在這裏開始”，表示大運河的黑色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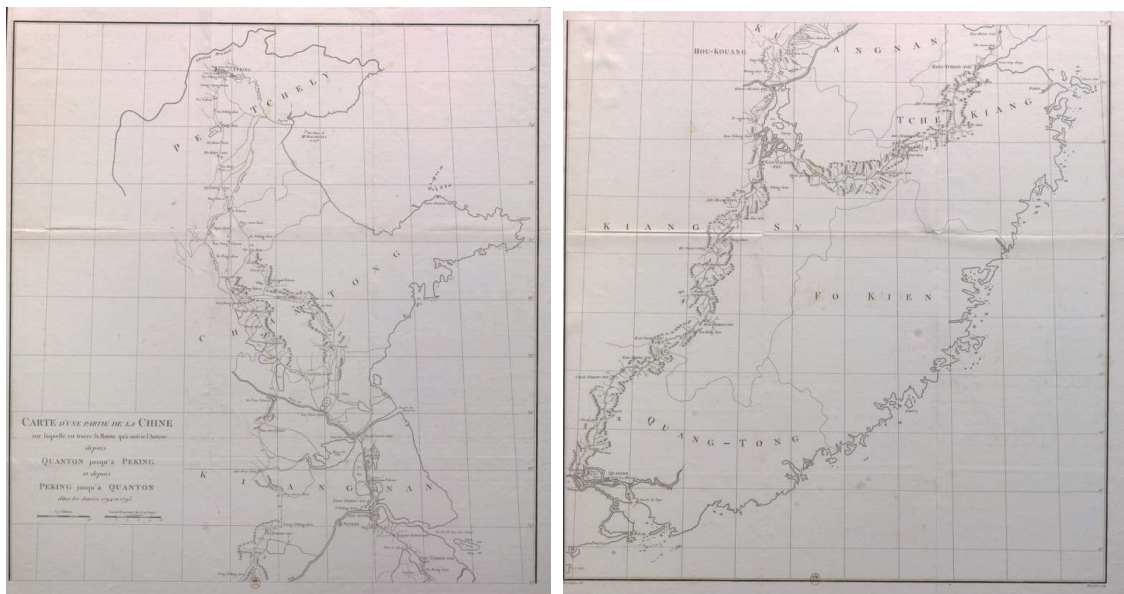
^①“Route of the Dutch Embassy to and from Peking in 1794-1795.”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by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R. Phillips, 1798.

線在這裏戛然而止，而不是尼霍夫譜系粵道圖那樣繼續沿大運河直至通州。此處應該不是簡單的誤記，因為無獨有偶，在一張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1737年由德國人哈斯（Johann Matthias Hase）繪製的中國地圖上，^①用顯眼的紅色線條繪製出從澳門出發的粵道路線，但這條線段同樣停止在臨清。當時西方地圖採用單色印刷，手工上色，哈斯中國地圖上的這條紅線也可能是後加的，但都反映出某一時期西方人對中國京杭大運河的認知。使團1794年11月底從廣州出發入京，到達江蘇省時已經12月下旬，運河可能因冬季少水而停運；使團1795年2月離京，3月上旬抵達淮安，在這裏他們才改乘運河船隻繼續行程。

從范罷覽這張英文版地圖可以看出，使團進京和離京都沒有以運河為主要路線，而是大致沿長江、運河兩岸走陸路。其中一段路程在一張繪製於1874年或之後的《大清一統海道總圖》中得到印證：^②使團在山東境內依次經過清平縣、高唐州、德州進入直隸，走景州、阜城縣、獻縣、河間府到達雄縣，再由新城、涿州、良鄉縣進入北京；離京時北京到德州沿原路返回，到德州以後改走平原縣、禹城縣，之後繼續走陸路直至淮安府，才回到傳統的運河路線。使團沿馬嘎爾尼使團的返程路線，由運河到杭州，再由浙江進入江西，到南昌府回到傳統粵道路線返回廣州。

（3）小德金《中國局部地圖：1794至1795年從廣東到北京的往返路線》（圖22）

圖22 小德金《中國局部地圖：1794至1795年從廣東到北京的往返路線》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① Hase, Johann Matthias.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 Homanianorum Heredum (Norimbergae), 1737.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E BB 565 (14, 17),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9730401>.

^② 大英圖書館收藏，館藏號 Maps 62655 (3)。

該圖（Carte D'une Partie de La Chine sur Laquelle est Tracee la Route Qua Server L'Auteur Depuis Quanton Jusqu a Peking et Depuis Peking Jusqu a Quanton Dans les Annees 1794 et 1795）^①收錄在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的《1784至1801年間前往北京、馬尼拉和法蘭西島的旅行》（*Voyages à Pé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中。作者小德金是著名的法國漢學家，曾擔任荷蘭德勝使團的翻譯，隨使團前往北京。他在1808年出版了自己的四卷本遊記，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與范罷覽不一樣的視角，可以參照互補；其中一卷為圖集，當中就附有本圖。

為適應圖書裝幀，該圖分為上下兩頁。上頁繪製從北緯31°至41°，包含北京至吳江縣的地理範圍；下頁繪製從北緯21°至31°，包含嘉興府至澳門和上川島的地理範圍。圖中以雙虛線繪出行程路線，根據使團每一天的路程標出日期，並註記沿線各主要地點的名稱。該圖的下一頁是一張澳門城平面圖，是根據前文所述阿格特繪製的《澳門港城圖》製作，^②該圖同樣也被收錄在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

（四）阿美士德譜系粵道圖

馬嘎爾尼使團失敗後，英國於1816年向中國派遣了第二次外交使團，希望中國開放通商口岸，進行自由貿易。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 – 1857）擔任大使，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和埃利斯（Henry Ellis）擔任副使。1816年2月，使團從英國南部出發，7月初抵達廣州，乘船從海路於8月13日抵達天津，並在8月29日抵達北京。回程時，使團按照傳統廣東貢道路線沿大運河南下，經長江、江西抵達廣州，1817年1月從澳門再次登船返回英國。由於種種原因，阿美士德使團未能實現貿易談判的目標，任務再次失敗。

阿美士德使團回到英國後，副使埃利斯和使團成員阿裨爾（Clarke Abel）等人出版了遊記。其中繪製了使團路線的地圖。

^①“Carte d'une Partie de la Chine sur Laquelle est Tracée la Route qu'a Suivie l'Auteur Depuis Quanton Jusqu'à Péking et Depuis Péking Jusqu'à Quanton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 *Voyages à Pé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 by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Paris: Impr. Impériale, 180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ET FOL-UB-164, <http://catalogue.bnf.fr/ark:/12148/cb30555797m>.

^②該圖題記中即說明，阿格特這張《澳門港城圖》是為小德金製作的。

(1) 埃利斯《英國使團路線圖：從白河口到北京，再由此到廣州》（圖 23）

圖 23 埃利斯《英國使團路線圖：從白河口到北京，再由此到廣州》



圖片來源：耶魯大學圖書館。

該圖（A Map of the Rout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from the Mouth of the Peiho River, to Peking and from Thence to Canton, in the Year 1816）^①收錄在埃利斯 1818 年出版的《第二次訪華使團紀要》（*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書中，圖高 49cm，寬 38cm，比例尺約 1: 5,000,000，海岸線以暈線示意海拔。地圖繪製阿美士德使團在華的內陸行程，從天津白河口（即大沽口）到北京，再從北京到廣州的路線。地圖標記了沿途主要地點的名稱。使團返程路線由大運河抵達揚州府（1816 年 10 月 10 日）後轉入馬嘎爾尼使團沒有走過的長江段，因此埃利斯在長江段記錄了較多的大小地名，並在停經的地名旁註明日期。使團沿長江逆流而上，從九江府（11 月 14 日）轉入鄱陽湖，直至南昌府（11 月 23 日）。這成為本圖與前圖不同的主要特徵。埃利斯在同一書中還繪製了另一張《英國使團路線圖：從瓜州到南昌府》（Map of the Rout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upon the River Yang-Tse-Kiang, from Kwa-Choo to Nan-Chang-Foo）的地圖。^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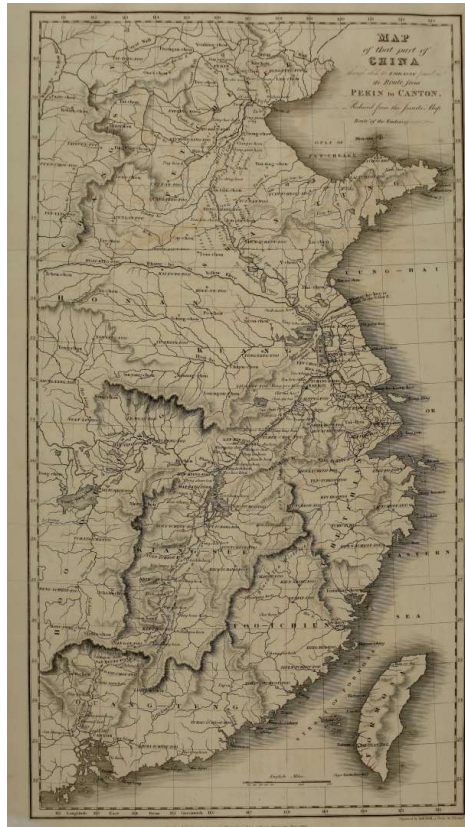
^①“A Map of the Rout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from the Mouth of the Peiho River, to Peking and from Thence to Canton, in the Year 1816.”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by Henry Ellis, London: A. Small, 1818.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5510584>.

^②“Map of the Rout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upon the River Yang-Tse-Kiang, from Kwa-Choo to Nan-Chang-Foo.”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by Henry Ellis, London: A. Small, 1818.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ttps://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items/510d47dc-9211-a3d9-e040-e00a18064a99>.

與其他粵道圖相似，本圖也在南安府和南雄府之間繪製了一道橫向的山脈，標記“梅嶺山”（Meeling M.¹⁵）。圖中標記了澳門，同時也標註出香港、南丫島等珠江口東岸的島嶼，顯示出英國人對珠江口東岸的關注。

(2) 霍爾《訪華使團途經路線圖：從北京到廣州》（圖 24）

圖 24 霍爾《訪華使團途經路線圖：從北京到廣州》



圖片來源：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該圖（Map of that Part of China through which the Embassy Passed on Its Route from Peking to Canton）^①收錄在阿美士德使團醫生和博物學家阿裨爾的遊記《中國內陸之旅與航行紀事》（*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一書中。地圖由倫敦的地圖出版商悉尼·霍爾（Sidney Hall，1788—1831）製作，他被認為是最早使用鋼板雕刻作品的製圖師之一。該圖在1734年唐維勒的中國地圖進行簡化，同時把阿美士德使團旅途中的記錄補充到地圖當中。作為博物學家，阿裨爾沿途所見有關動植物、土壤等自然狀況簡要註記在地圖當中。與埃利斯的書一樣，阿裨爾的書裏也另附有一張《英國使團揚子江路線圖》（Map of the Route of the Embassy on the Yang-Tse-Kiang）。^②

^① Hall, Sidney. “Map of that Part of China through which the Embassy Passed on Its Route from Peking to Canton.” Reduced from the Jesuit Map. In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by Clarke Abel,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② Hall, Sidney. “Map of the Route of the Embassy on the Yang-Tse-Kiang.”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by Clarke Abel,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阿美士德使團在華行程路線地圖的流傳廣泛。倫敦地圖出版商詹姆士·威爾德（James Wyld, 1790—1836）先後在 1824 年、1841、1848 年繪製的《中國地圖》（China）中，都繪製了阿美士德使團的在華路線。^①

設立在加爾各答的英屬印度測繪總局 1859 年繪製的《中國沿海圖：廣州和北京之間各省簡圖》（Map of the China Coast and Rough Sketch of the Provinces Lying between Canton and Peking），^②在底部的註釋中寫明，該從鄱陽湖到南京的揚子江段則參考阿裨爾繪製的 1816 年阿美士德訪華使團路線圖。

（五）入華耶穌會士譜系粵道圖

明清兩代大量的入華傳教士，也是沿着這條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入京或深入中國內陸腹地。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文化和宗教沿着這條路線向內地輻射，因此該路線也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交流之路。儘管入華耶穌會士有繪製地圖的傳統，但他們當中僅有很少的繪製這條路線的地圖存世。目前學者較為熟知的是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在《利瑪竇史料：天主教傳入中國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書中繪製的“行程圖”，^③繪製了 1585—1601 年間羅明堅、利瑪竇在華的主要行程，圖中可見早期入華傳教士在華行程與本文所討論的從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基本一致，再通過沿途水路深入內陸腹地。但德禮賢此圖出版於 1942 年，並非由入華耶穌會傳教士製作。

目前筆者僅見一套由早期入華耶穌會傳教士繪製的粵道航線地圖，是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繪製或與之有關的 3 張手稿，藏於法國國家檔案館，^④分別繪製（1）澳門至淮安、（2）臨江至鄱陽、（3）江西省。具體內容還有待研究。

四、意義與結論

直至鴉片戰爭前後，甚至到 20 世紀初，西方製圖師還在中國地圖或者太平洋西岸地圖中表現粵道內河航線，表現出這條內河航線對於中國貿易甚至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意義。

例如著名的英國製圖師和地圖出版商阿羅史密斯（Aaron Arrowsmith, 1750—1823）1798 年繪製的《太平洋海圖》（Chart of the Pacific Ocean），^⑤該圖主要表現的是北緯 28° 到南緯 56° 從中國南部到澳大利亞之間的西太平洋海域，繪製了 1760—1790 年代多條航線，其中在中國內陸僅繪製出從澳門（Macao）到臨江府（Lin-Kiang-Foo）之間的內河航線，

^① James, Wyld. *China*. Edinburgh: John Thomson, 1824.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s/xshcuq>.

^② James, J. O. N., Abdul Haleem, Bulloram Nath, H. M Smith and John Walker. *Map of the China Coast and Rough Sketch of the Provinces Lying between Canton and Peking*. Calcutta: Surveyor General’s Office, 1860.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MAP RM 5080, <http://nla.gov.au/nla.obj-2164648712>.

^③ D’Elia, Pasquale. “Itinerari.” In *Fonti Ricciane.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1.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④ 法國國家檔案館，館藏號 MAP/6JJ/74/A pièce12B, 13B,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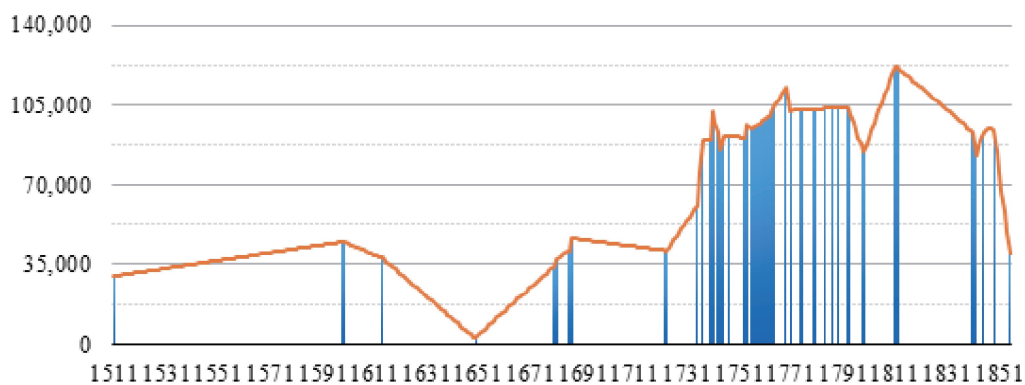
^⑤ Arrowsmith, Aaron. *Chart of the Pacific Ocean*. London: Arrowsmith, 1814. Access from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60573op/australia-philippines-china-etc-chart-of-the-pacific-arrowsmith>.

並在南雄府和南安府之間用虛線連接。英國水文學家、海圖出版商諾里（J. W. Norie）在 1850 至 1880 年間不斷再版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局部總圖》（A General Chart of the Indian and Part of the Pacific Oceans）中，^①繪製和表現從非洲到西太平洋的廣闊區域的海域，各洲內陸部分僅繪製出印度和澳洲東南部的河流，在中國內陸則僅繪從澳門到南京的內河航線。

1830 — 1870 年代阿羅史密斯製圖家族出版的中國地圖中，大多對粵道內河航線有所表現，例如用格外顯眼的紅線或虛線將其繪出。阿羅史密斯製圖公司 1874 年被愛德華·斯坦福（Edward Stanford）收購，其地圖轉由斯坦福出版，直至 1904 年，在斯坦福出版的中國地圖中，仍特別標記出粵道內河航線。

儘管西洋各國在沿途不能開展直接貿易，但通過澳門進出口的商品也大致沿着這條路線流通，並影響着沿途的稅收。以設置在贛州的贛關為例。“贛關為粵省咽喉，全恃出入海口各貨往來以充盈餘”。^②我們可以從 1511 — 1851 年間贛關的稅額看出，贛關的稅額顯著受到時局和海禁政策的影響。明代貿易量不大，但總體是緩慢上升的趨勢；明清鼎革期間斷崖式下跌，其後再度增長至晚明水平；1757 年廣州一口通商後迅速提升，直至鴉片戰爭前處於高位；鴉片戰爭後開放五口通商，贛關貿易量急劇下降，而江西也逐漸從出入海口的貿易大省蛻變成一個內陸的省份（圖 25）。

圖 25 1511 — 1851 年間贛關白銀稅收統計圖（單位：兩）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朱批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中有關贛關的檔案。轉引自：廖聲豐：〈清代贛關稅收的變化與大庾嶺商路的商品流通〉，《歷史檔案》，第 4 期（2001），頁 85 — 92。

通過粵道地圖譜系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歐洲繪製這條中國內陸航線分別有四次高

^① Norie, J. W., J. S. Hobbs and Charles Wilson. *A General Chart of the Indian and Part of the Pacific Oceans, Shewing the Various Passages to & from China, Australia, New Zealand, &c. Carefully Constructed & Compiled from the most approved Observations and Modern Surveys. F.R.G.S. Hydrographer.* London: Charles Wilson, 1850, 1870.

^② 《宮中檔朱批奏摺·財政類·關稅》，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江西巡撫錢寶琛摺。

峰，分別是 1655 年的荷蘭使團初訪中國、1793 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1794 年荷蘭德勝使團訪華、1815 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此外還有人華耶穌會士繪製的地圖和其他衍生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 1655—1815 年中國朝貢體系下的中外關係，而這一時期的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發揮着重要作用——西洋各國的貨物經過澳門—廣州內河航道抵達北京和線輻射內地其他地區，同時陸上絲綢之路的貨物也由這條航道南下到廣東和澳門。從這個意義而言，澳門至北京的內河航線是聯結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紐帶，澳門則是這條紐帶上最關鍵的節點之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李文娟〕